

歷史與空間

許更生

「南溪草堂」營建時間考略

「南溪草堂」是莆陽大地一座普通古草堂，但又是一座非凡、值得紀念的草堂。因為它與媽祖文化緊密相連，是明代禮部尚書林堯俞(1558-1626，字咨伯)整理《天妃顯聖錄》母本、並寫作首序的祥瑞之地。可以說，媽祖重要典籍的發源地之一，就在南溪草堂。然而，四百多年過去了，南溪草堂的確切地址和營建時間，長期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。

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，就在於它的存世時間太短，頭尾僅十餘年；並且，這期間真正的親歷者、目擊者寥寥無幾。二百五十多年前，即清中期的乾隆年間，莆田邑人鄭王臣在《莆風清籟·蘭陔詩話》中就曾感歎道：「吾鄉前賢歸田後，多築郊墅，如郭尚書(應聘)之鍾潭，曾侍郎(楚卿)之棠坡，彭侍郎(汝楠)之柳橋，林尚書(堯俞)之南溪」，而今「幾何不復，為荒煙蔓草乎」！可見「南溪草堂」當時就已經完全荒圮，不復存在了。加上由於明清史冊記載語焉不詳，以致南溪草堂的營建時間更為撲朔迷離。

由來已久的誤傳是：1625年林堯俞晚年辭歸時卜築；近來還有建於1613年10月的誤讀。謝天謝地，林堯俞摯友何喬遠的《鏡山全集》問世了(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4月)——果然如同一面鏡子照亮幽暗。2002年，福建省文史研究館人員訪日時，從日本內閣文庫複製購回明崇禎刻本150萬字《鏡山先生全集》。該書《四庫全書》未收，內地已無全帙。這一海外藏本的發現，不僅為研究何喬遠，也為研究林堯俞



■南溪草堂畫作。

網上圖片

打開一片新天地。何喬遠的《鏡山全集·南溪草堂集序》，為南溪草堂營建時間提供了相關答案：「先生(指林堯俞)從詞林循資至南司成(國子監祭酒)，亦居家久之，比時時相間開；又十餘年，予一過莆中，飲先生南溪草堂，綢繆數日，甚歡也。」何喬遠(1558-1631)與林堯俞(1558-1626)同庚，且「長先生一月」。

據林堯俞本傳，林公一生嘗三度辭歸莆田家居。其中第二次為萬曆三十六年(1608)，從南京國子監祭酒任上乞退，居家達14年之久；1621年春，林堯俞復出，天啟五年(1625)從禮部尚書任上第三次乞歸，翌年冬病逝。1618年，何氏「過莆中」訪廣化寺、南溪草堂，頭尾正好11年，即序文中所稱的「又十餘年，予一過莆中，飲先生南溪草堂」。此序兩次明確出現的「南溪草堂」四字，說明它確實卜築於林堯俞第二次居家期間——而並非1625年。

不過，「又十餘年」光陰畢竟太長，能否細考一下，南溪草堂究竟是哪一年建造的？2015年9月中華書局出版的《張燮集》，進一步提供了寶貴信息。其中有封林堯俞寫給張燮的信曰：「時小齋壘石未就，今就(完成)矣……頃又承乏(謙稱兼職)郡乘」云云。據查，林公是明代萬曆四十年(1612)四月受命「承乏」纂修興化郡志的，並於1613年10月完成，共計59卷。此前的1611年，林堯俞很可能前往漳州回訪張燮家園，故張賦詩曰「林咨伯祭酒先駕見訪……宋比玉在坐」。

此信函中之「時」，應該就是針對那次「見訪」而言的，當時，「小齋(南溪草堂)壘石未就」；而「今」、「頃」對稱，則是指1612年4月。換言之，南溪草堂竣工完就之日，也就是林公剛剛「承乏郡乘」之時——1612年4月，整個建築工期歷時一年多。

書若蜉蟻

■葉輝

茅湖廢堡與馬游塘

話說茅湖山位於調景嶺，北部山麓有茅湖仔村；而茅湖山上有圓形古堡遺址，山友多稱之為「茅湖廢堡」。從現存歷史文獻推算，此一廢堡在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以前就已存在了，料為清朝佛堂洲海關之觀測台，至少有逾百年歷史，現已列為一級歷史建築。茅湖山一帶原為山野，面向半圓形海灣，因波平如鏡而被漁民稱為「照鏡環」。

少年時家住油塘邨，此邨早已清拆，記憶中，童伴經常到鄰近山野遊玩——從魔鬼山走至藍田半山，再沿小徑經調景嶺山腰往北走，就是五桂山了。此山原稱五鬼山，話說清初時，此山一帶時有海盜出沒，故稱為五鬼山，其後逐漸雅化，即為五桂山。再從五桂山輾轉遊走，不久就走至茅湖山了。

早前重遊此地，途中見有大圓環鐵絲網洞，穿越網洞登上山腰，就到達茅湖廢堡。廢堡遺址現存圓形石砌塔樓的下半部，及長方形鄉村式石屋，攀登廢堡頂部平台可俯瞰將軍澳全景；塔樓與石屋俱由深灰火山岩所建，石材應採自附近的石礦場。

此一圓形塔樓乃視野廣闊的瞭望塔，或可想像，清代海關的觀測者可從半圓形窗戶監察佛堂門航道，從而得知此一航道動靜。此一塔樓原有兩層，第二層早已倒塌，僅存一條石樓梯可通至已倒塌的二樓，據歷史照片顯示，塔樓原有拱頂，塔頂已不復存在，今日所見，只餘石製窗框及門框。

茅湖仔觀測台可遠眺佛堂門，翻查史料，早在南宋慶元六年(1200年)，佛堂門就建有海關了。及至明朝中葉，廣東沿海乃有三路巡海備倭官軍，中路「自東莞縣南頭城，出佛堂門、十字門、冷水角諸海澳」，佛堂門乃中路防禦範圍。此外，天啟二年(1622年)，荷蘭東印度公司軍艦闖入佛堂門，其時新安縣知縣陶學修率領軍民將荷蘭人擊退；清廷於同治七年(1868年)重新設立稅關，佛堂洲現存稅關遺址，由四闕斷碑組成之石碑，上刻「德懷交趾國貢賦遙通」，下刻「稅廠值理重修」，當中尚存石柱、石板和基石等。

在茅湖廢堡遊逛後下山，途經分岔路，從左路直下就是馬游塘村。此村乃通往將軍澳的山坳之地——根據1924年政府軍部地圖所顯示，其時馬游塘或馬溜塘之英譯為Ma Lau Tong，當中有村屋數間及農田，山坳有河涌直流至觀塘(其時稱為官塘)之沼澤地帶出海；及至二戰時，此處列為「馬游塘防線」(Ma Lau Tong Line)；二戰結束後，不少地方文獻都述及此一英文地名，倒與馬游塘村此一客家村落有所不同。

據《坑口鄉事委員會五十周年特刊》所載，馬游塘村命名是與開村祖先有關，昔年開村先祖來到馬游塘村，觀察風水及地形，似是馬兒在塘邊遊走，此乃村名之由來。時至今日，馬游塘村為客家雜姓村落，約始建於三百年前，以李、劉、曾三姓為主，各姓俱建有祠堂。



■茅湖廢堡已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。 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畫中有話

圖：K.Wong



來鴻

少小離家，忽遠忽近地走過了天南地北，飄泊之中，鄉愁恰似一個不離左右的磁場，總是讓人在距離的移動中感應到能量。鄉愁是一種懷舊，不必等濃濃的烏髮漸漸變成稀薄的白雲，次第盤旋上了顛頂。懷舊是一種成熟的標誌，包含對少年時代天真夢想以及挫折的銘記，也包含終於成長起來的矜持。雖說到了不了的地方叫遠方，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，但鄉愁卻攔攔人回去看看，只是通往遠去故鄉津樑已斷，只留下一條懷念的彩虹，彩虹很美，但走到近前就不見了。宋之問的名句說：「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。」鄉愁確如指南針一樣，如果把它置於恒久指向的南極，恐怕總要滴溜溜亂轉，難免有幾分難以把持的迷亂。

鄉愁是一輪圓月，在漆黑的夜幕上，鑿空出一處靈魂穿越孤獨時空的隧道入口。源源不斷地從生命開

始的地方，默默輸送來生命的活力，不經意間填補現實零碎的斷層。用一點灑脫的放任，一點笨拙的純真，一點無忌的稚嫩，一點隨意的誠懇，於是發現，生命的寶藏，原來就埋在自己心靈的深處。有人說：忙碌是一種幸福，讓我們沒有時間痛苦；奔波是一種快樂，讓我們真實感受生活；疲憊是一種享受，讓我們無暇空虛。然而，再忙碌、奔波、疲憊，鄉愁總會頑強地浮上心頭，來變平被揉搓皺了的歲月，校正明日行程的方向，並讓人爭取到一點產生思想的權利。

不願在別人的倦怠處留下過多似有實無的痕跡，是命運安排一場幼年的擦肩而過，它推動一生的波瀾，操縱漫漫追求路上各處難以長久收留的情感。當燈光拉長了白晝，濃茶縮短了黑夜，貧血的心結冰的情，面對所剩無幾的酒杯，莫名的鄉愁，正如不肯枯竭的泉源，總能激起創造的激情，告訴我希望

古典瞬間

王兆貴

史上最成功的文化炒作

英國小說家、戲劇家威廉·薩默塞特·毛姆，常以客觀、冷靜甚至挑剔的態度審視人生，諷刺和憐憫意味很濃，在國內外擁有大量讀者。有則故事說，毛姆成名前其小說無人問津。為窮困所迫，只好用最後一點錢在報上刊登一個啟事：本人是年輕有為的百萬富翁，喜好音樂和運動。現徵求與毛姆小說中女主角一樣的女性共結連理。廣而告之後，毛姆的小說很快就賣光了。

講述這段故事的人認為，正因這一獨創性炒作，改變了毛姆的命運。如上述廣告真是毛姆所為，竊以為是不可取的，因這無疑是編造謊言欺騙讀者，毫無誠信可言，算不上獨創性炒作。歷史上真正富有創意的文化炒作，發生在公元前239年的秦都咸陽，主持人是一位政商合一的高手，名叫呂不韋。

秦王政八年的一天，咸陽城門前聚集眾多仰頭圍觀的路人。只見城門上掛出一排書簡，並有千金懸賞，佈告說：「延諸侯游士之《呂氏春秋》，亦稱《呂覽》。」這部書簡就是被譽為雜家之首的《呂氏春秋》，亦稱《呂覽》。據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記載，那時魏有信陵君，楚有春申君，

趙有平原君，齊有孟嘗君。他們都禮賢下士，結交賓客，並以此互爭高下。

呂不韋認為，秦國這麼強大，這方面卻不如人家，豈不丟臉？於是也廣招天下文人學士，給以優厚待遇，以至前來的食客有三千之多。當時，諸侯中很多像荀況那樣的能言善辯之士，著書立說，傳佈天下。呂不韋就讓他們各錄所聞，各抒己見。然後匯編起來，分為八覽、六論、十二紀，二十多萬言。

為讓這部書能名動天下，為更多人所聞知，於是出現上述一幕。消息傳開後，人們蜂擁而來，果然無人改動一字。其實，再完美的文章也有可改之處，只是時人懾於相國權勢，不敢改動罷了。儘管如此，呂不韋還是得逞了，他創造的這一轟動效應，讓《呂氏春秋》很快傳遍四方，成功地擴大自己的影響，堪稱「奇貨可居」，足以揚名立萬。於是，有人聯繫到周天子鎮國之寶「皓璽」的傳說和呂氏對異人子楚的「包裝」過程，把呂不韋說成是我國最早的投資經紀人和最成功的文化傳播人，拿此看成是一次成功的文化炒作，也就順理成章，並無不妥。

鄉愁不易言說

龔敏迪

永遠大於現實的可能。雖說懷舊的觀眾只有自己一人，總是散場後不願離去，等待下一場播放，同樣的故事，不變的結局。但我從中間到泥土的芬芳，在朝霧裡深深呼吸一下，晨光似銀中，我會下地去泥土裡辛勤耕耘，哪怕難忍的淚花，也要讓她結出燦爛的果實。我知道那時故土的鳥兒和蟬唱，會為我單純地歡呼，不在乎評論家的存在。

喝一口故鄉榨來的茶，鄉愁最易於在胃底深處被喚醒，那是母親留下的滋味。古人說茶禪一味，和茶一樣，鄉愁本來就有宗教般的意味，是不能完全應用於實用，卻可以騰出心靈的空間。正如故鄉飄逸的白雲，夜夜進入我的夢裡，芳香而美麗的鮮花，日日沁入我的眼鼻，清澈的溪水，時時流入我的心田。按照康德的說法是：「形而上學中體現了人類的終極關懷。」這裡面沒有價格，卻有價值，精神上得到

的愉悅，豈可用對待物質的辦法，加減乘除來算計。

鄉愁如虹，連詩的語言，也常常難以言說它無為而無不為的虛無美麗，於是我只好用它來談禪。茶話裡語都要輕聲地說，人與人之間不能輕輕說話，並非彼此聽不見，而是心與心之間的距離太大。

讀一段老家帶出來的書中文字，感受到老祖宗留給我們是一塊需重新打磨的荊山玉。如何讓這種文化的鄉愁注入新鮮活力，成為荒漠中的甘泉？發掘我讓我在困頓時得到精神的撫慰，挫折時癒合流血的創傷，在經濟創造奇跡的同時，富足我們的精神倉廩，修飾我們心靈的面貌，繼續滋潤曾經擁有過的五千年輝煌，再造一個無敵而優雅的現代家園，豈不是一個更偉大而艱巨的事業？我想，這也是目前中華兒女共同期望的鄉愁。

生活點滴

戴永夏

古代官員的救災騙局

歷代的中國官員，都喜歡以「父母官」自居，標榜自己「一心為民」——有福與民同享，有難與民同當，遇事為民做主，遭災帶民救災。應該說，悠悠三千年，這樣的「好幹部」也湧現出一些，如大禹、西門豹、蘇東坡等都有口皆碑，傳之千古。然而也有些官員卻口是心非，陽奉陰違，玩弄權術，欺騙百姓。美國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蓋洛在他的《揚子江上的美國人》一書中，就記述了四川萬縣的一些政府官員，在救災中施行種種騙術，騙取百姓信任，偽造政績工程，讀來頗覺新奇。

1903年，蓋洛來到中國，在長江流域進行人文地理考察，對所經之地的自然景觀、社會風貌、人生百態、風土人情等做了真實而又生動的記錄。當他到達萬縣後，聽說這裡已發生多起火災。為防止火災再次發生，縣官便貼出告示，用嚴厲口氣命令人們在遇到火災時要爬到屋頂上，打破六個雞蛋，並且將一把米撒在大火裡，以此來消滅火災。

當被問及這樣做是否真的有效時，這位縣官支支吾吾地答道：「不。但我們必須做這些事，以使百姓滿意，並向他們展示我們是在認真地為他們謀福利。」他的話一語洩露了天機，原來他們號召百姓使用的滅火方法，連自己都不相信。之所以這樣做，不過是為了從欺騙中撈取政治資本，塑造自己的「光輝形象」。

當大火真的燒起來時，撒米、打雞蛋等救火方法自然不管用。這時，官員的職責要求他們，為了百姓的利益必須勇於犧牲，即縱身跳入火中，以平息火神的怒氣。狡猾的「父母官」自然不肯為此丟掉性命，而樣子又不能不做，於是他們又以當年曹孟德「割髮代首」為榜樣，想出一條「錦囊妙計」：將自己的衣服、帽子和靴子等一起扔進火中，以衣代身，為民「粉身碎骨」。這樣，既保全了性命，又平息了神怒，還「服」了大眾，對自己來說是「三全其美」，而老百姓卻照舊倒霉遭殃。

跟救火一樣，官員抗旱也經常玩弄花招，搞騙人把戲。當遇到旱災時，當地官府也會貼出告示，告誡大家為戰勝旱災，人人必須戒葷，嚴禁屠宰和吃肉。這樣一來，豬肉店被關閉了，到城裡賣雞鴨的鄉民也受到嚴懲。然而縣官們大魚大肉吃慣了，幾天不吃肉心裡就難受。再說，有時上級官員下來「視察」，接風宴席上如果少了雞鴨魚肉，他們如何取悅上司？為此，這些地方官員又啟動自己的「智慧」，搞出了「土政策」：哪天想吃肉，或有上司到來需要招待，便在這一天取消戒葷的禁令，這樣他們便可藉機大加犒勞一番。

對於旱災形成，當地還流傳着這樣的說法：由於廢棄的舊水井裡住着魔鬼，這些魔鬼能施展魔法，阻止老天下雨。於是官員們又「順應民意」，「為民除魔」，一遇乾旱，就將廢井的井口用罪犯用過的木枷封住，以防惡魔跑出來作祟。他們還在木枷上貼紙條，寫檄文，痛斥惡魔造成的災難。這樣變戲法似的略施小計，就能騙得百姓信任，贏得「關心百姓疾苦」美名。

在救災中，官員們不僅擅於騙人，而且還能騙神，按照當地習俗，選用黑狗抗旱：將一隻黑狗打扮成人模樣，放進轎子裡，由四個人抬着沿街遊行。遊行過後再「負荊請罪」——所有政府官員都自帶枷鎖，列隊來到龍王廟，跪在龍王爺面前懺悔。儘管這不過是做樣子給人看，也損失不了什麼，但有的官員卻很不甘心，狡猾地說：「在民眾眼裡，我只不過是一個小神，我們還是從大神開始吧！」於是便讓人把龍王爺的塑像搬出廟來，放到縣衙門的院子裡。他搬把椅子坐在龍王爺身旁，煞有介事地和龍王爺「談論」天氣。「談」了一會，他藉機偷偷溜走，只留下龍王爺在烈日下暴曬，直曬得身上的油漆全起了泡，他卻躲在陰涼角落幸災樂禍，自鳴得意。

蓋洛所見到的這些救災騙術，雖然醜陋可笑，從中也能看出一些政府官員虛偽奸詐的醜惡本質，但這些尚屬雕蟲小技，對民生倒也無大害。而更為有害的，是那些假借救災之機騙取錢財、貪污自肥、坑民害民的「大騙」。這樣的大騙，儘管蓋洛先生未能觸及，但一些古代詩人早有洞悉。明代詩人楊旭在《捕蝗謠》就對此進行了曝光：捕蝗捕蝗，官隸齊忙，掘地縱火蝗飛揚。官要供給，隸要酒漿，官隸踐踏苗已僵。吁嗟乎！蝗未死，苗已僵，捕蝗之蝗甚於蝗！

詩中，詩人深刻地揭露了一些官吏借捕蝗之機對百姓敲詐勒索的醜行，他們「捕蝗」的結果，蝗蟲沒殺滅，莊稼倒枯死了。他們所造成的危害，遠勝於蝗災。詩人在這裡雖然寫的是治蝗，但卻不限於治蝗，因為一些官員的欺騙手段和貪腐本性，幾乎無孔不入。在治理水、旱、火等災害上，也同樣大行其道。